

再论奈达翻译理论之属性

杨司桂

(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要] 自本世纪初以降,中国译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奈达翻译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具有静止性、封闭性以及自足性等缺点,这样,奈达翻译理论也具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带来的种种缺陷,在当下的译学研究中已经过时。然而,通过研究发现:奈达的语言观与结构主义语言观有着许多根本性的不同,不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此外,奈达的翻译理论与结构主义翻译观也有着很多根本性的差异。职是之故,我们认为奈达翻译理论不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最后指出,对于奈达及其翻译理论的认知,不能平面化,而应立体化,要多方位、多角度地去综合关照。

[关键词] 奈达翻译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翻译研究;综合关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7)02-0117-05

On the Nature of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YANG Sig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there exists a prevailing point of view in Chinese translation circle—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is considered to be fallen within 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tatic and closed; therefore,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bears various deficiencies relevant to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for this reason,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is viewed as being out of date nowadays. However, Nida's linguistic theory differs enormously from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besides,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regard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as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end, the author stresses that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should be apprecia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ther than two dimensions, and we are supposed to approach Nida and his theory from many perspectives or facets.

Key words: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structural linguistics; 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1914—2014)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以及翻译理论家,其翻译理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译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自本世纪初以降,中国译界“常常对奈达的一些核心理论横加批评、甚至彻底否定”,^{[1]4}大有全盘否定之趋势,理由是:奈

达翻译理论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的翻译观,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具有静止性、封闭性以及自主性等缺点,因而奈达的翻译理论具有与之相应的种种弊端,如:“很难适应翻译中灵活多变、有具体语境的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况,”^{[2]174}“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以及程式化,……没有考虑翻

收稿日期: 2017-01-07
基金项目: 遵义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奈达翻译思想再研究”(BS[2015]23)
作者简介: 杨司桂(1972-),男,湖南怀化人,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译过程中的语用维度、语用意义以及文本的社会及文化语境,”^{[3]195}“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一面;”^{[4]54}或认为奈达的翻译理论受乔姆斯基语言观很大的影响,因而具有科学性,属于纯语言的翻译转换;^[5-6]甚至还有人认为“奈达翻译理论属于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在解构主义面前已经过时”,等,不一而足。国内其他学者如王东风、^[7-9]孙会军、^[10]徐岚、^[11]林克难、^[12]卢玉卿和温秀颖、^[13]李菁、^[14]杨晓荣、^[15]陈伟和廖美珍、^[16]王恩科^[17]等在其论文或专著中,也提到过与此相同的观点。事实果真如此吗?本着学术争鸣之精神,笔者不揣浅陋,愿就“奈达翻译理论的归属”问题求教于大方:

一

奈达一开始只是一名语言学家,从事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后来受到美国《圣经》学会的邀请,才去从事《圣经》翻译实践研究。之后,在结合自己对语言学以及《圣经》翻译实践之研究,奈达构建了一套完备且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奈达的语言观对其翻译理论的构建起了很大的作用,进而言之,奈达的语言观可以说是其翻译理论的构建基石。职是之故,我们要认识奈达翻译理论之属性,要了解这一理论是不是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先看看奈达的语言观是否属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第一,两者对语言“形式”及“功能”的认识不同。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与音响形象。”^{[18]101}加上语言的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结合,而与外部世界无涉,所以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形式,而不是其它的东西,用索绪尔的话说,关注的是“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18]169}至于语言的功能,索绪尔没有论及,因为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研究都限制在静态的语言系统内,而与具有实质内容的外界无涉;奈达则认为,要了解翻译原则的基本含义,就要关注语言的各种交际功能以及这些功能在语言的运用中是如何产生的。他从翻译原则的角度,把语言功能分为表达功能、认知功能、人际功能、信息功能、祈使功能、移情功能、交感功能、施变功能、审美功能等,并对之进行了深入详细的阐述。^{[19]25-32}

第二,两者对语言系统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语言系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由于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脱胎于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传统的语言学对语言的本体关注不够,没有本学科自己的自主地位,因而,索绪尔主张关起“门”来在语言系统内对语符进行静态研究,所以,索绪尔研究的语言系统是封闭的,与外界无涉;奈达对语言系统没有提及过,但从其对词语意义主要是联想意义的阐述以及对语言功能观之论述,可以得知:奈达主张语言系统应与外部世界接触,主要是与语言使用者进行接触,并认为:一个语符的实际意义取决于它所在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20]31}而这一点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中是没有涉及的,我国学者赵艳说过,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最大缺陷就是对时间维度与人的因素没有关注。^{[21]65-66}

第三,两者对语言的意义观之认识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点是确定奈达翻译理论是否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或结构主义译论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意义观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存在的最大“交集”,而翻译说到底还是译意。那么,索绪尔的意义观与奈达的意义观有什么不同呢?索绪尔对意义的相应阐述,仅仅停留在语符的价值层面之上,认为语符的价值是意义的一个要素,与其它语符价值相对立而存在,“它们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它要素的关系确定的。它们的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18]163}由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仅限于与外界无涉、与时间无关以及没有人为因素介入的真空状态下的语言系统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语言系统,因而系统内的语符价值当然是静止的、恒定不变的,因而其意义也是静态的,语符存在一个永恒的“逻各斯”意义。与索绪尔对语符价值论述不同的是:奈达对意义的研究不仅局限于语言系统内,而更为关注语言系统外的诸多因素如人为因素、文化因素、人类学因素等。这样,语符除了存在一个所指价值(即所指意义,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与外界无涉的静态的语符价值)外,还有一个联想意义或曰语用意义,该意义之强弱与其所指价值或意义非常不成比例,^{[22]35}而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境有关。显然,奈达看重的是意义的语用层面,即语用意义,因为任何成功的交际在于接受者能否成功地理解说话者所说的语用意义。^{[22]36}此外,奈达在其专著《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中,对意义与语境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翔实的阐释。^{[20]157}由于奈达的意义观牵涉到了语符的使用者以及语境等

其动态因素,故其意义观应该是动态的意义观。而国内一些学者把奈达的意义观定为是静态的,并认为奈达本人在翻译时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逻辑斯意义,这种观点显然与事实不符。

从以上几个比较维度来看,奈达的语言观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是不一样的,不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因而,把奈达的翻译理论归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是不恰当的,是对奈达翻译理论的一种误解。

二

有学者认为,奈达翻译理论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或结构主义译论是因为:奈达借用了乔姆斯基语言观中的相关术语,而乔姆斯基又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所以奈达翻译理论应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国内学者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可能是受了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影响。在《当代翻译理论》第三章对奈达的翻译理论进行评论时,根茨勒认为,由于奈达翻译理论借用了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核心句”等概念术语,因而奈达的翻译理论具有结构主义科学性这一性质。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奈达借用的这些概念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中的这些概念是不是一样的呢?奈达借用这些概念与乔姆斯基使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这个问题,马会娟在其专著《奈达翻译理论研究》中进行了较为翔实的阐述,^{[23]69}认为奈达借用这些术语是为了探讨翻译的过程,且其翻译模式与乔姆斯基的转换模式也不相同;除此之外,奈达借用这些概念是为了解决翻译中的语义问题,而乔姆斯基是为了探究句法形式问题。^{[23]82}此外,就理论性质而言,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也不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两者非常对立:乔姆斯基的基本立场是唯理主义的形式化,而结构主义则是经验主义的描写。我们知道,乔姆斯基的老师哈利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但乔姆斯基却完全不是,所继承的只是对结构的关注而已。有趣的是,尽管根茨勒谈到了奈达翻译理论之结构主义科学性这一性质,但是在《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这本书中,还是赞同苏珊·巴斯内特的说法,把奈达的翻译研究归为翻译研究的文化阶段,而把佐哈尔与图里的翻译研究纳入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阶段。^{[24]194}

此外,对乔姆斯基理论的借用情况,奈达在后

来的著作中如《从一种语言的另一种语言》、《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等已不再提及,论述的重点明显偏重于认知语言学及语用学,例如,提到了莫里斯的语用观,^{[22]34}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论^{[25]7}语用学中的语境论^{[20]157}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以及象似性理论,等等。职是之故,说奈达翻译理论借用了乔姆斯基的相关术语,而乔姆斯基又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所以,奈达翻译理论应属于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

除此之外,据现有资料考证,没有哪位国外学者把奈达翻译理论纳入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不过,倒是有学者把奈达翻译理论纳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而把佐哈尔与图里的翻译理论归入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学派。^{[26]131}把奈达理论纳入文化派主要是因为奈达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关注文化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功能对等论,而把佐哈尔与图里纳入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学派,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关注重点为语言形式,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也是语言形式间的相互关系,等。

不可否认,奈达的翻译理论或多或少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这只出现在其理论形成的早期阶段,这一点,国内学者如谭载喜、^[27]马会娟、^[23]刘军平^[28]等在其论文或专著中都已提及。不过,就奈达整个翻译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成熟阶段而言,更多的是受到了认知语言学、符号学、社会语言学,尤其是语用思想的影响,例如,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多次运用莫里斯的语用观来阐释自己的语用意义观;^{[20]34}利用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论来论述翻译就是一种交际,原文与译文只存在功能上的对等,而不存在一一的匹配关系;^{[25]7}还使用了格莱斯的语用合作原则来说明语言交际与翻译之关系。^{[29]24}尤为一提的是,奈达运用了语用学中的语境论,浓墨重彩地阐述了语境与意义的关系问题。^{[20]157}这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奈达的翻译思想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

四

以上从语言观的层面对奈达翻译理论之性质归属进行了论述。那么,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具有哪些特征?与奈达的翻译理论又有着多大的

联系?以下将从翻译观这一层面来阐释奈达翻译理论的归属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或译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带来的一些显著特征:第一、该翻译理论具有静止性、封闭性以及自主性等缺点,很难适应翻译中灵活多变、有具体语境的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况;^{[2]174}第二、该理论认为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以及程式化,……没有考虑翻译过程中的语用维度、语用意义以及文本的社会及文化语境;^[3]第三、该理论认为,“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2]62}那么,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否具有以上特征呢?我们先来看看奈达的翻译理论:

第一,奈达翻译理论注重翻译中的联想意义,而联想意义是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外部世界相联系的,^{[20]31-33}其具体所指要视具体语境而定,包括语言语境与非语言语境,^{[20]157}这样,奈达的翻译理论不得不关注语言系统外的诸多因素如人为因素、文化因素、人类学因素等,因而,其翻译理论是动态的、开放的,是与外面世界相联系的;此外,奈达翻译理论是一种交际翻译理论,为了适应接受者的语言需求与文化期待,^{[30]29}实现其跨文化之交际目的,奈达主张“译者要做出成千上万次的涉及选择与处理的决定,以顺应另一种文化,顺应另一种语言,顺应不同的编辑和出版商,最后还要顺应读者群”。^{[31]7}职是之故,奈达的翻译理论应是灵活多变的,能适应具体的翻译语境。

第二,奈达一生致力于翻译过程之研究,把翻译过程分为原文分析、意义传译、译文重组及译文检验等四个阶段,并努力使之科学化。对于原文分析,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语义的分析,主要为语法及词位的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之分析,也谈了语言单位之间的语法关系。奈达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一书中,特别强调语符的意义是灵活的,其具体意义视具体语境而定。^{[20]157}此外,奈达非常重视原文以及译文中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特别是文化语境,认为“文本意义与相应的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词语的最终意义也只有在相应的文化语境中才有意义”,^{[20]286}并发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有意义”。^{[20]82}

可见,奈达并没有把翻译过程简单化,更没有忽略翻译过程中语用维度、语用意义以及文本的社会及文化语境。

第三,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等情况,奈达从来没有说过可以达到完全的等值。早在1964年,奈达就说过,“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对应符号被赋予的意义还是这些符号排列为词组和句子的方式,既然如此,就有理由认为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这样,也就不存在完全精确的翻译。”^{[22]156}此外,奈达分别在1993年及2001年反复强调不要把误读了他的对等论,“‘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25]117[20]87}由此可知,奈达并不主张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

综上所述,说奈达翻译理论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或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或说与乔姆斯基的理论有很大的联系,从而认为奈达的翻译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或结构主义译学理论,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奈达翻译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成熟,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语用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奈达翻译理论简单地囿于某一学派或归属于某一主义钳制下的译学理论,就会把一个立体化的译学理论做平面化的处理,很难走进奈达的翻译理论,更谈不上获取其翻译思想之精髓。我们应该多角度、多元化地深入该理论发生的历史语境以及社会背景,综合关照多种因素去了解奈达的翻译理论,这样才能接近事实的真相,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笔者期冀以此为契机,通过对该问题之关照,对我们的译学研究有所裨益:对某一学者的译学理论不要轻易贴标签,更不要脸谱化某一学派或某一学者,而要深入其境,多方位关照某一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成熟,这样才能接近真相之判断。由于笔者能力有限,以上研究存在不足或缺陷,望起到“瓦器微鸣,以待黄钟”之作用。

参考文献:

- [1] 谭载喜.当代译苑的恒久之光:追忆一代宗师奈达[J].东方翻译,2011(6):4-14.
- [2] 吕俊.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3] 曾文雄.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J].社会科学家,2006(5):193-197.
- [4] 王洪涛.启发与警示:奈达理论之于译学建设[J].天津

- 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50-55.
- [5] 张景华. 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 [6] 徐艳利. 共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主题建构[D]. 开封: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
- [7]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 中国翻译, 2002(5):24-26.
- [8]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 中国翻译, 2004(6):3-9.
- [9] 王东风. 功能语言学与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07(3):6-9.
- [10] 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11] 徐 岚. 论译者的主体地位[J]. 中国科技翻译,2005(3):56-59.
- [12] 林克难. 从对意义认识之嬗变看翻译研究之发展[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91-94;116.
- [13] 卢玉卿,温秀颖. 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意义观:一个历时的视角[J]. 外语教学,2009(1):104-108.
- [14] 李 菁. 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15] 杨晓荣. 二元·多元·综合:翻译本质与翻译标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 [16] 陈 伟,廖美珍. 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嬗变与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J]. 外语教学,2012(4):100-103.
- [17] 王思科.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反思之反思[J]. 外国语文,2013(1):96-99.
- [18]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9] NIDA, EUGENE 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M].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Inc, 1986.
- [20] NIDA, 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1] 赵艳. 结构主义语言学:诠释与批判 [J]. 外语学刊, 2007(4):64-66.
- [22] NIDA, EUGENE 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3] MA, HUIJUAN. A Study on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 [24]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5]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26] 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7]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28]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29] NIDA, EUGENE A.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 [M]. The Hague: Mouton, 1975.
- [30] 费小平. 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1] NIDA, EUGENE A. “A Fresh Look at Translating”, in Beeby, A., D. Ensinger & M. Presas.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ranslation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12.

责任编辑:李珂